

汉代儒生教育家“官僚”和“学者”的身份偏向——董仲舒与郑玄的比较研究

李瀚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摘要：官僚性和学术性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教育家都可以用这个维度来进行分类，尤其在刚刚“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家学说有关“仕”和“学”的关系说法深入人心。有些学者重视“仕”，认为学习必然要为国家服务，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偏向于“学”，无心从政，只求钻研学问，董仲舒和郑玄就是这两种偏向的代表。董仲舒要通过政治手段来发扬自己的教育理念，郑玄则更愿意通过教学和钻研来“成一家之言”。虽然同受儒家教育，但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也代表了汉代的教育家们的身份偏向。

关键词：董仲舒；郑玄；官僚；学者；儒生教育家

DOI:10.69979/3029-2735.24.9.051

经过秦末混乱，终于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汉王朝。中国古代教育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出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教育家。他们要么像董仲舒、贾谊等人一样，上书劝谏，力图在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通过自己的政治作为来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可以称他们是“官僚”偏向的教育家；要么像王充、郑玄一般，不图政治地位，钻研学术，亲身教学，想要用自己的文字、学术和教学工作来影响自己身边的学生，他们便可以称作“学者”偏向的教育家。其中以董仲舒设太学和“独尊儒术”和郑玄贯通古今的注疏最为著名，他们可以分别代表“官僚”和“学者”的两种偏向。通过比较两人在有关教育方面的可以窥探中国汉代时期教育家的两种不同的身份偏向。

董仲舒是西汉武帝的得力助手，在他辅佐武帝期间，设立太学，兴办选举，统一学术。自董仲舒开始太学制度被建立，并且使儒家文化逐渐走上舞台的正中心，影响后世千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郑玄生于东汉末年，为求学术不惜离开太学，求学于马融，而后注《论语》《尚书》等数册儒家经典，收罗门徒百千余人，终其一生“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以其百余万字的注疏，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儒学经典学术研究。因为他们都是“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1]，所以他们两者实际上都可以称为教育家。

但与此同时，两者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实行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官僚”和“学者”。受儒家思想

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家都把教育和社会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教人积极入世。^[2]作为“官僚”的教育家，他们还是政治家，他们偏向从更宏大的角度，总体上把握国家的教育情况，董仲舒就是这一类教育家的代表。作为“学者”的教育家，他们还是研究者或教师，他们会通过热爱教学，沉心研究，郑玄一生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与郑玄，代表了汉代教育家的两种身份偏向，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感知传统教育家角色。

1 志向不同且道路相异

就教育背景来看，董仲舒和郑玄是有相似之处的。汉初，“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儒学的各个典籍得以重新回到历史舞台。董仲舒得益于此时开明的政策，年少时便可诵读《春秋公羊传》等保留下来的儒家经典。到汉代末期，因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和兴办太学的政策，郑玄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并通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汉书·郑玄传》）等等儒家经典，这为他未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同样受到儒家经典著作的深刻影响，但两人明显选择了不同的志向以践行儒家之道。汉武帝时期，社会恢复曾经的活力之时，“黄老之学”不能满足统治阶级解决各种问题的要求时，曾一度重蹈秦朝的覆辙：天下“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民”（《汉书·董仲舒传》），完全是法家的治国思维，民众的举止行为

受到压迫,是一种表面稳定实则暗流涌动的社会。这不是儒者所想看到的。那么作为儒者,他致力于依照《春秋公羊传》构建一个“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尊之”(《汉书·董仲舒传》)的和谐社会。那么若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成为一名政治家,并且是身兼教育家的政治家。使“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自己应该成为辅佐王者“一统天下”的助手。

郑玄则有所不同,他并非学生出身,相反他的人生经历是从当官开始的。少年时的郑玄便已经是一个地方的小官员,但郑玄所求无外高深学问,于是便辞官入太学求学。汉代学者们致力于考据古籍,整理训诂,一时间针对有限的儒家经典,演化出了无数相关论述,“枝叶繁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列传》)。除古籍发掘之外,汉代儒学并未有在思想上的发展。因此郑玄在太学所学不能满足自己的求学志向,于是“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后汉书·郑玄传》)求学问道的经历结束后,便开始从事注经、教学活动。

作为一个东汉时期的儒家学者,郑玄的教育和研究内容不可避免地要与今文和古文经学打交道。汉代四百年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蓬勃发展,开枝散叶,其中衍生出了两派,名为齐学和鲁学,这便是后来的今文和古文两派。两派就经典是追求原意还是服务现今,展开激烈论战。但这只会使“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荒废学业。于是自己依靠自身学术优势,兼杂古今,既恢复了经典的真实面貌,又能有益于今人,为后世立下学术典范。这是一个通过学术手段整顿思想混乱局面的举措,郑玄凭一己之力,了结了汉武帝以来的儒生的“禄利之路”(《汉书·儒林列传》),规整了学风,重新树立起了儒家学者的形象。其教育的本心也在这规范学术过程中显现出来,郑玄所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教育和学术造诣,润泽后世万千儒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相继请他出山,皆不同意,只求静心注经教学,两汉四百年间的古今文之争竟然被归于一统,天下儒生皆往拜郑玄为师“至远方至者数千”,可见郑玄学术之高深,教学之闻名,俨然是一位学者作态的教育家。

不同的志向往后衍生出了两人不同的道路走向,以政治家为目的的董仲舒最终就职官府,从一个统治阶级的角度,阐发自己包括教育在内的种种思想;以学问为最终目标的郑玄最终果真没有做官,纵使各路诸侯争相

邀请“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抱朴子·逸民》),也毫不动摇,通过自己的学者工作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2 政策理论貌合神离

历史上的汉武帝,对外驱逐匈奴,对内积极改革。教育方面,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整顿文化教育。当时的汉朝虽然强盛,但是内部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急需一套新的理论来团结国内的力量。董仲舒的理论为汉朝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董仲舒将“儒家的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3],使皇帝的正统性有了理论上的支撑。那么为了支撑这一体系,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解决了上层的决策问题,怎么使儒家的学说体系持久运行下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持久地运行便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持有相同思想、政见的人入朝为官,董仲舒便为这些人安排了两条道路:太学和察举制。

太学和察举制,殊途同归,只在于过程和对象之不同。太学培养内容是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人才观培养人才,察举制不在乎你的培养过程,而是在考察时会以儒家的人才标准来考量人才,实际上还是需要学生或所推之人有儒学功底。景帝时期的文翁兴学,到武帝时期进一步发展,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学校官到中央太学学习考察,将教育思想内容带到地方,地方学生又可以通过察举考察获得政治地位,实际上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教育体系。可见作为政治家的董仲舒教育政策设计之精巧。

董仲舒是一个政治家,每一项政策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董仲舒以三大文教政策最为流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以养士”“察举制”。究其思想根本,在于教育为政治服务。对个人的教育目标只是镶嵌在他的政治目标上而已。并且董仲舒的政策建议是极为可行的,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虽然有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也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集权政府。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推行改革的基本保障,其冲破制度约束和政治约束,动摇既得利益集团,保证改革顺利推进。^[4]董仲舒所建议的文教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操作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全面而深入的洞察力和实在而有效的执行力。

如果说董仲舒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整个教育体系,郑玄作为一个学者则有另一种看待教育的视角。虽然郑玄从事学术工作,但他也“不是

一个不问世事的隐者”。^[5]郑玄对于教育体制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论，形成了自己对理想学制系统的主张。^[6]在《礼记正义》第三十六卷中关于《学记》的注解中，郑玄认为应当以君主为核心，设计一套由内及外的教育体系。在《仪礼注疏》中写到中央应设国子学教贵胄子弟，设太学庠序以教育学生。在地方设置地方学校官，遵循古制由退休官员主持。同时设立一套逐级选拔培养的渐进式的教育模式：“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毛诗正义》卷十）郑玄笔下描述的教育体制是对于古代教育制度的总结和发展。同时，根据考据的古代文献，郑玄对自己这套教育体系的教育内容进行了填充，将“德”与“行”列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强调学习圣人之道，《学记》所记载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郑玄注解时写道：“所学者，圣人之道。”^[6]郑玄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每一项有关教育的论述实际都是在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阐发，并简洁地记录下来，以便供学者，学生交流传阅，因此在郑玄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纯正的儒家文化的气息。

只不过，当我们考虑郑玄所处的时代时，我们就可以发现郑玄所构想的文教政策不过只是不切实际的。郑玄开始从事教学研究的时间正是东汉末年外戚专政，皇权衰微之时，后又遇到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如出一辙，此时适用于太平时期的儒家礼教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专攻经文的学者不免会囿于文字的局限而无法体察环境的变更。那么作为学者为什么还要论述相关政治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作为儒家学者的必然，由于儒家学说本身即渗透着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内容，即便是隐逸之士，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也不可能与政治无缘。^[7]只不过，作为学者，郑玄所追求的也并不是要让自己的观点为政治家所采纳，“现实已不容许他施展经学的政教理想”，他只能“把六经代表的政教以及现实的关怀融入经注之中”^[8]，那么政策实施的环境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3 话术逻辑各有千秋

董仲舒和郑玄都作为教育家，在不同的层面展开教育相关的工作。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中说道：“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郑玄：“本立而道生。言以学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于俗无不成。”（《礼记正义·学记》），两人教化的目标基本相同。只是董仲舒一心为国，需要有自己的政见的完整论述使人信服。而郑玄一心为学术，总是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教化带来的实

惠。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窥见两人的不同之处。

先考察董仲舒的相关论断，对于“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给出了完整论述。董仲舒遵照“《春秋》之法”首先神化了皇帝的角色“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并且以此为自身思想的出发点。在建元元年，汉武帝亲自策问百余人以“古今治道”（《资治通鉴》十七卷），董仲舒首先向汉武帝传达治国不在刑法而在“德教”，之后依照《春秋公羊传》的“元”字的解释，引申出人也是从“贵者始”，也就是说从“人君”开始，“人君”就是指汉武帝，那么要想治国有效就要从皇帝本人做好，皇帝的影响一步一步由朝廷到百官，由百官到万民，有万民到四方。这样一来不仅国泰民安，而且可以风调雨顺。那么现如今虽然皇帝惜才爱民，但是仍然“天地未应”“美祥未至”原因在哪，原因就在于“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

董仲舒这一番言论的逻辑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以皇帝为天人之间的联系，一步步向下影响。在整个关于教化的说辞中，同时将皇帝的地位抬高到接近神的高度，德政、教化都是在皇帝的“旨意”下为了“一统”的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而已经存在的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有思想上的统一作为长治久安的后盾。整个逻辑体系十分严密，将教育“化民”的目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而且在言语上创造了能实施这套理论的条件。董仲舒的言语来看每一层都有着国家力量的参与，同时为的也是国家稳定强盛，这便是一个有政治家身份的教育家的特点。

郑玄的教化观念的本质就是上行下效^[6]，与董仲舒的思想是一样的。但是且看郑玄的观点表达方式。《毛诗正义》中，郑玄写道：“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对比董仲舒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多了几分轻松的感觉，以风之偃草作比君之教民，非但使各路学者明了其观点，更能使学生生动理解自己的思想，在学生的心中埋下儒家正统观念的种子，这样的论述势必不能打动统治者，但郑玄也不需要打动统治者，这番对古制的怀念与以古代贤王为榜样的论述，足以打动自家“仍读先王之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学生们。同时相比于董仲舒来说，他关于任何事的主张都难以找寻到大段的完整论述。并且主要都分布在《论语》《礼记》中相关教育的话题中。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单独的论著而否认郑玄的儒学功底，郑玄“质于辞训”“经传洽熟，称为纯儒。”（《后汉书·郑玄传》）郑玄的思想如只言片语散落在课堂教学当中，郑玄所注的语句仿佛像是在听取郑玄亲自授课一般。陈澧在《东塾

读书记》中记载有顾炎武在学习郑玄所注的《六经》之后的感想：“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东塾读书记·郑学》）”这大概也是郑玄注经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自己对文本的独到解读中，影响一个个学习过自己作品的读者，“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一个学者的最终理想吧。

而在个人的意见发表上，董仲舒的口吻多有建议、警告的意蕴，如《对贤良策》中“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从反面告诫统治者教化之必要，能为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更添一块筹码。郑玄则完全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出发注解《礼记·礼运》“讲学以耨之。”时，简明扼要地写下“存是去非类也。”结合《礼记》中的比喻和郑玄的注释，形象地阐明了教育的作用。

可见，作为官僚，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人尤其是统治者听到你的声音，痛陈利害是必要的途径，如果董仲舒以郑玄的方式向汉武帝建言，多半也不会被采纳。相反，作为学者，求真求实，简明扼要，“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家之学能够被准确传达给尔后的学者才是要务。

4 教学原则粗细有别

董仲舒的教育宗旨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修身和治学。在《春秋繁露·二端》中董仲舒强调了修身和治学的重要性。修身在外表现为行为上的修行：“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汉书·董仲舒传》）强勉的精神，不论对于学生的为学还是修道，都是最基础的部分。同时董仲舒还强调自身力行的的重要性，“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可以看出对学生的行动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这种力行不是一时的，应该是长久的“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显”。此外董仲舒最提倡“仁义”。重义轻利是为人的必要品质。“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更是董仲舒针对人的对外和对内的态度的标准的总结，用“仁”的态度来对外待人接物，用“义”的要求来对内严于律己。董仲舒的教育宗旨是一个对做人的标准的衡量。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学，实际上都能兼采这些条例，作为行为的准绳。

郑玄与董仲舒不同，郑玄笔下与教学相关理念是以长年累月的教学和注疏工作为基础的。儒家喜爱效法先王之作态，郑玄也是如此，做儒者要“以先王之道能儒

其身”（《郑氏佚书·周礼目录》），同时要以“先王之道”为志，同时享受寻道的快乐，“乐谓志于道”（《郑氏佚书·论语注》）。为了明志，郑玄与董仲舒一样，赞同身体力行的必要性。志向是内在的，其外在表现就是实行。^[1]在教学中郑玄重视“思”的作用，在《礼记正义》中指出“思而得之则深”。同时赞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这是一个能让学生深入思考的过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郑氏佚书·论语注》）。另外，与荀子的反复记诵，“故诵数以贯之”（《荀子·劝学》）不同，郑玄更看重学生的理解，主张“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简练的语句更适合学生理解，反对“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礼记正义·学记》）的机械记忆方法。并且郑玄注重学习时的循序渐进，主张“先易后难以渐入”。郑玄还将自己的学术素养带入了教学环节中。注经需要的是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郑玄对自己注经的工作情况有一个举例，在《六艺论》中写道：“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畧，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皮锡瑞也称郑玄的治学工作“并及孝经春秋之注”（《六艺论疏证》）。可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

那么，郑玄相比于董仲舒，郑玄的思考也是来自自身的教学和古代经典，而面向的也都只是普通的学生。在对学生学习的细节上做了更多的规定，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学术工作，将每一项教学的原则都聚焦到学生的个体身上去的。学生从立志，读书，解经到成为学者，这其中都有着郑玄的影响。

作为官僚的董仲舒注重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国民，教学方式方法与学生的道德品德修养相比稍处逊位。而作为学者的郑玄则是相反，能够使学生获得学习的技能是郑玄的教学目标。怎样理解语句，怎么博采众家，又怎样的学习态度和志向，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但是在郑玄在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后教给了他们每个人学习的方式方法，这相比于董仲舒所定下的教育目标来的更加具体。

结语：身份偏向影响下的教育家

董仲舒和郑玄两人，代表了汉代教育家的两种生存方式，一种是作为官僚的教育家，另一种是作为学者的教育家。陈青之在他写的《中国教育史》中这样描写道：“董氏是想借国家的权力施行他的教育政策，我们可称他是政治家的儒者；郑玄是想用讲授的方法宣传他的教育宗旨，我们可称他是‘学者派的儒者。’”^[9]对作为教育家的儒者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只不过，事实上，汉

代的教育家身上并不是单独存在这两种性质之一的特性，他们的身上同时存在这两种特点的，只不过会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自我认同感有两种特性之间的消长，但绝不是全部归于其中的一种。董仲舒和郑玄就是最好的例子。

首先，在志向上，作为教育家，一是为师教书育人，二是为官为国育才。董仲舒选择了后者，郑玄选择了前者，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而易见关联。所谓育人最终是为国，而为国育才必定要经过育人的过程。

其次，在政治蓝图的勾勒上，为官的董仲舒显得更加实际，考察了国内的形势状况，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在可行范围之内，并且理论叙述完整可靠，说服且能够顺应统治者的想法。作为学者的郑玄则更偏向理想主义，取自古代经文的政策在当时只是学者在乱世中的妄想，可以说作为学者，眼界更容易被经文的世界所束缚住了。

再次，在话术的表达上，官僚和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做官，要的就是使统治者能够听见并且听进去自己的发言，痛陈利害可以说是必要的途径。董仲舒想要让汉武帝采纳自己的建议，就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完整且明确的理论，二是让汉武帝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作为官僚，话语不能像教学时那么生动，话术需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警示作用。而作为学者，与做官则完全不同，面对学生和同僚，要能用简明扼要的话语让他们理解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

最后，就教育的宗旨原则来看，官僚教育家对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明确的答案。因为所期望的是培养出能够维护统治，延续自己思想的人才，这些人的身上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质都给出了明确的标准。然而他们对于培养的过程的关注则较少，而这部分却被学术教育家所看重。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育家与官僚体系下的教育家不同，他们更加关注学生个人的学习，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传承书本或自己的语句，获得最佳的学习方法才是他们的目的，一切都是围绕学生的个人发展而阐述的。

《论语》有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作为儒者，所学就是为官执政之法。在秦汉时期，作为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儒家经典，给当时学者的志向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使汉代的学术与政治的

关系极为密切。^[10]虽然从政成为了目标，但是学习仍然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简单来说，想要成为“官僚”必须先经过“学者”这个过程。虽然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大略》）但是以功名为奖励的古代选官制度让学者们向往仕途。这便造成了古代教育家们身上会携带着官僚性和学术性两种特性，尤其是在汉代，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经学研究盛行。而当科举制度作为“永制”而确立之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思想逐渐转入内向，钻研心和理成为主流，鲜有学者能够再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教学研究联系起来，“官僚”和“学者”两种偏向愈发明显，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 沈玉顺：《“教育家”评价标准建构及其内涵解析》，《上海教育科研》2010年第9期
 - [2] 胡德海：《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教育研究》1998年第8期。
 - [3]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 [4] 田园，李成明，周建波&于水婧：《汉武帝时期经济改革：顶层设计与大国崛起——新中国7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得失借鉴》，《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8期。
 - [5] 梁宗华《郑玄的人格与经学》，《孔子研究》1996年第3期。
 - [6]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155、157、154、160页。
 - [7] 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228页。
 - [8] 谷继明：《郑玄易学中的天道与政教》，《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 [9]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 [10] 徐建委：《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文史哲》2022年第1期。
- 作者简介：李瀚文（2000-），男，河北省邢台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